

环境政治学译丛

全球视野下的环境管治： 生态与政治现代化的新方法

[德]马丁·耶内克 克劳斯·雅各布 主编
李慧明 李昕蕾 译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in Global Perspective:
New Approaches to Ecological and
Political Modernisation**

山东大学出版社



环境政治学译丛
Environ-Politics

全球视野下的环境管治： 生态与政治现代化的新方法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in Global
Perspective: New Approaches to Ecological
and Political Modernisation

[德]马丁·耶内克 克劳斯·雅各布 主编
李慧明 李昕蕾 译

山东大学出版社

[内容提要]本书全面系统地阐述了“生态现代化理论”的核心理念以及一些在相关领域实证研究的经验性发现。作为一本论文集,本书的作者基于生态现代化的理论框架,主要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和分析视角,从全球视野出发,致力于对不同经济社会走向生态现代化过程中的各种影响因素与进程加以分析和探讨;经济生态现代化潜在的促进因素与潜在的障碍以及先驱国家的特殊作用;领导型市场的培育及其对经济社会生态化转型的重要意义;环境技术及其支撑性政策的革新与扩散的影响因素及路径;当代民族国家政府环境管治政策与手段的革新;能源政策的绿色整合;环境政策制定的国际影响因素以及一些国际环境问题的管治与解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全球视野下的环境管治:生态与政治现代化的新方法/(德)耶内克,
(德)雅各布主编;李慧明,李昕蕾译.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2.4

书名原文: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in Global Perspective:
New Approaches to Ecological and Political Modernisation
ISBN 978-7-5607-4566-4

I. ①全... II. ①耶... ②雅... ③李... ④李... III. ①环境
管理-研究 IV. ①X3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58227 号

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 20 号 邮政编码:250100)

山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720×1000 毫米 1/16 25.75 印张 381 千字

2012 年 4 月第 1 版 201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46.00 元

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凡购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本社营销部负责调换

总 序

在当代世界中,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生态环境问题与社会可持续发展已被公认为是人类 21 世纪面临的最富有挑战性的难题之一。传统的工业化与城市化的生产生活方式的反生态本质或不可持续性特征已暴露无遗,而同样清楚的是,在从根本上改变智力支撑着现时代的物质主义生存方式的现代化思维模式之前,人类很难找到一条通向明天的现实道路。因而,人类自从进入文明时代以来,从未像今天这样需要挖掘与展现我们的理论反思潜能:通过重新思考我们与周围自然世界的关系,特别是人类作为其中一部分而不是主宰者所应担当的适当角色,来重新构建一种可以使得人类长久地在地球上生存的经济、政治、社会与文化。正因为如此,我们不仅需要自然科学与工程意义上的生态学或“科学生态学”,而且需要(如果不能说更需要)人文与社会科学意义上的生态学或“人文生态学”。沿着上述思路,我们才能正确理解正在蓬勃兴起的、人文与社会科学视野下的大量边缘性与交叉性新学科的意蕴,比如生态伦理学、生态哲学、生态经济学、生态营销学、生态社会学、生态人类学、生态文化学、生态法学、生态文学等等。就此而言,笔者所指称的环境政治学或生态政治学也是这些形成中的诸多新兴学科之一。

环境政治的研究在欧美等西方国家主要集中在生态政治理论、环境运动团体和绿色政党三个层面,但从更一般意义上说,环境政治还可以包括更为广泛的内容,比如民族国家政府的环境管治及其政策决



策、环境政府间和非政府间组织的跨国环境管治合作及其全球政治参与，等等。因此，从总体上说，环境政治学或生态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还远未成熟，从研究对象到研究方法都需要作深入的研究。

部分是基于环境政治学这门学科本身所具有的成熟性，部分是基于对人类所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自身与时代特点的理解，笔者并不主张急于对环境政治学作出看似明确、实际上很可能制约其发展的界定，而是更愿意将其宽泛地规定为一种政治学视野下思考生态环境问题的新视角。具体而言，这包含着两方面的含义：其一，环境政治学可以大致地规定为介于政治学与生态学之间的一门交叉性、边缘性新学科。依此，我们可以不必像对待传统学科那样过分在意它的学科独立性或“名分”，而是给予其充分的自由扩展与深化空间，这样可能反而更有利于它的学科发展与成熟。其二，由于生态环境问题明显是一个具有超出了单一传统学科研究对象归属的“超普遍性”和影响到人类基本价值认知的“深层次”问题，因而，只有以一种超越传统哲学与政治学框架的视野与开放性，才有可能突破原有认知与思维模式的局限，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环境政治学或生态政治学。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切反灰色的都是绿色的。

基于上述认识，笔者认为，环境政治学在中国发展的切入点或突破口应着眼于以下两点：一是要坚持研究方法上的比较政治学观点或方法。这其中既包括不同学科视野下对生态环境问题研究的比较，也包括世界不同地区环境政治学理论与实践的比较。对于前者来说，对生态哲学研究已有成果的消化吸收，是其他生态环境问题相关学科包括自然科学学科的理性元点，环境政治学也不例外；对于后者来说，我们并不认为欧美等西方国家掌握着人类通向绿色未来的真理或“锁钥”，也不认为中国可以回避作为一个当今世界最大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的历史责任与创造潜力，但我们的确认为，只有对欧美国家社会与经济生态化发展经验的分析借鉴才有可能成为任何绿色文明与社会创建的现实起点。二是要争取研究成果上尽可能广泛而及时的交流与分享。这其中一个基础性的手段当然是有选择地翻译介绍欧美等



西方国家学者在环境政治学领域的经典性论著,而它对于环境政治学理论与方法在中国的普及和中外学者学术交流的重要性都是不言而喻的。

编辑出版《环境政治学译丛》是在上述两方面意义上的一个尝试,目的是推进环境政治学在中国的起步与发展。需要强调的是,目前呈现给读者的这一统一的“环境政治学译丛”(共12册)是自2005年开始陆续翻译出版的。2005年翻译出版了《绿色政治思想》(安德鲁·多布森)、《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戴维·佩珀)、《环境运动:地方、国家和全球向度》(克里斯·卢茨)和《欧洲执政绿党》(斐迪南·穆勒—罗密尔和托马斯·波古特克)。2008年翻译出版了《自由生态学:等级制的出现与消解》(默里·布克金)、《生态社会主义还是生态资本主义》(萨拉·萨卡)、《当代多重危机与包容性民主》(塔基斯·福托鲍洛斯)和《地球政治学:环境话语》(约翰·德赖泽克)。2012年翻译出版了《绿色国家:重思民主与主权》(罗宾·艾克斯利)、《环境与公民权:整合正义、责任和公民参与》(马克·史密斯、皮亚·庞萨帕)、《全球视野下的环境管治:生态与政治现代化的新方法》(马丁·耶内克、克劳斯·雅克布)和《全球环境政治:权力、观点和实践》(罗尼·利普舒茨)。之所以选择这些著作,一方面是由于它们都已成为当代环境政治著述中的经典性作品或“必读书目”,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它们作为一个整体分别展现了“环境政治学”、“生态社会主义”、“生态资本主义”等环境政治学整体或某一主要理论与实践流派的最新概貌。

当然,如果没有大量研究基金、学术机构和国内外同行所提供的帮助与鼓励,《环境政治学译丛》在最近几年内的连续编译出版是无法想象的。因此,笔者要特别感谢“中欧高教合作项目”、“德国学术交流中心—香港王宽诚教育基金会”、“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项目、欧盟—中国研究中心项目、德国洪堡基金会、中国留学基金委员会,以及教育部“优秀青年教师资助计划”、霍英东教育基金会青年教师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项目“生态社会主义研究”、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教育部人文社科



研究规划项目“西方绿色左翼政治思潮研究”(09YJA710046)和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西方生态资本主义及其批评研究”(10BKS049)等所提供的主要财政资助。同时,在本译丛的编译过程中,我们还得到了安德鲁·多布森、斐迪南·穆勒—罗密尔、戴维·佩珀、托马斯·波古特克、克里斯·卢茨、萨拉·萨卡、塔基斯·福托鲍洛斯、约翰·德赖泽克、罗宾·艾克斯利、马克·史密斯、皮亚·庞萨帕、马丁·耶内克和罗尼·利普舒茨等提供的各方面的热情帮助,他们为各自著作的中文版撰写了专门的前言,而且萨拉·萨卡先生还对自己的著作作了一些文献资料性的补充与完善。

同样重要的是,我的同事和合作伙伴刘颖博士、徐凯博士、张淑兰教授、李宏博士、蔺雪春博士、郭晨星博士、侯艳芳博士、郭志俊博士、杨晓燕博士、李慧明博士和博士候选人李昕蕾女士等,他们在从事繁忙的教学科研任务的同时先后承担了本译丛的翻译工作。在此,笔者一并致以最真诚的谢意。

最后,笔者再次感谢山东大学出版社对《环境政治学译丛》的出版所给予的大力支持和所付出的艰辛努力,并真诚地希望,它能够成为我们共同期待的环境政治学研究在中国进入一个新阶段的起点。

郇庆治

2012年4月于北京大学

译者说明

译者对西方生态政治理论中颇有影响和发展前景的“生态现代化理论”的认识和了解,始于不久前的博士论文写作。作为一个初涉环境政治学的人,当时对这种生态政治理论的内涵和主张知之甚少。2009年9月开始,我们两位译者非常荣幸地来到了生态现代化理论的主要创立者——耶内克教授曾经担任主任的联邦德国柏林自由大学环境政策研究中心,分别进行博士联合培养和博士学位攻读。期间,也非常有幸地结识了耶内克教授,亲耳聆听了教授的演讲,并与教授进行了面谈。同时,教授还欣然同意作为其中一名译者的第二博士生导师,悉心指导其在该中心的学术研究。自此,一个立意高远和充满哲理与睿智的生态政治理论在我们的视野中开始逐步清晰起来。随着研究的深入,译者对这种理论(理念)所反映出来的思想和观念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和理解。生态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当前人类社会所面临的最具有挑战性的难题之一,而对这种难题进行分析和解决的理论主张也可谓汗牛充栋。在庞杂的理论丛林中,生态现代化理论独树一帜,并从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开始逐渐扩散至发展中世界,得到各国政府越来越多的关注和接纳,从而被付诸实践。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这种以强调技术革新和政策推动为核心的环境政策理念的强大价值之所在。正因为如此,这部环境政治理论文集被郇庆治教授纳入了其主编的“环境政治学译丛”。

生态现代化理论作为一种现实问题导向极强的生态政治理论,其



最为鲜明的特点在于与现实社会的紧密结合，其最为核心的主张和观点在于强调超越传统的那种末端治理方式，寻求通过一种前瞻性和预防性的环境政策的推动，促进技术革新，从源头上防治环境污染和破坏。更为重要的是，它为经济社会发展指出了一个方向和一条环境和经济双赢的道路。这一点，在耶内克教授和雅各布所编辑的这部能够反映和代表生态现代化理论核心主张和理念的文集中，有着清晰的反映。但是，唯其如此，该理论包含着异常宏大广博的社会科学知识和理论，几乎涉及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层面和领域，从环境社会学、环境哲学、环境政策学到管理学、经济学和政治学，无所不包。它为当前人类社会所面临的环境难题提供了一种基于经济技术视角的、可供选择的现实解决方案，同时也特别指出了民族国家管治的重要意义和政治现代化的必要性；它强调技术革新与市场机制的重要价值，同时也特别重视国家政府的政策推动与执行力；它关注社会经济的生态化转型和“绿化”，同时也着重提出了整个经济社会结构性宏观调整的重要意义。这种将生态技术革新、绿色经济发展同明智政策管治相结合的综合性的理论，为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促进低碳经济革新以及应对气候变化等方面的工作提供了很多前瞻性指导。从某种程度上说，多年来，我国也一直在努力探索一种生态现代化的发展模式，强调生态技术的革新、GDP的“绿化”以及相关保障性绿色政策的出台。比如2005年，中国制定了《可再生能源法》，从政策层面保障绿色新能源的市场发展，从而极大地推动了清洁能源的发展，特别是在风电发展领域，中国已经位居世界前列。当然，真正意义上的生态现代化路径的实现不仅需要相关环境政策的出台，更为重要的是，要实施一种部门性绿色政策整合战略，将生态理念纳入工业、交通、建筑、农业等各个生产部门，从而构建一个整体性、综合型的国家绿色战略，实现经济创新和环境优化相互促进的明智型管治。所以，我国的生态现代化之路依然任重而道远，需要我们年轻一代为之付出不懈的努力。

也唯其如此，翻译这部文集，不但对译者的英文水平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而且对译者的知识面和学识水平也是一个较大的挑战。为了



使国内读者能够尽量清晰地理解和认知生态现代化理论,译者在尽可能忠实于原文的基础上,力求关照中文读者的阅读习惯。为了读者阅读的方便,译者还对首次出现的人名、地名和一些较为生僻的名词或术语等,提供了其英文或母语的拼写。依循本辑译丛的翻译体例,并为了便于读者查阅相关资料与拓展相关阅读,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保留了注释的英文或德文样式。但限于篇幅,译者并没有保留原文的全部注释,对部分注释做了省略处理。

本书的译稿,是李慧明和李昕蕾分工合作的成果。期间,我们两位译者一个在济南,一个在柏林。感谢当今世界如此强大的通信网络和信息工具,在翻译期间,我们隔着半个地球进行了无数次的沟通和切磋,有时为了一个词、一句话的翻译,我们也能够“面对面”地进行探讨和协商。期间有焦灼与不安,有辛苦与劳累,但也有收获的喜悦和成功的欣慰。我们两人的分工具体如下:李慧明负责翻译了序言、导言、第一部分、第三部分的后两章以及第五部分,李昕蕾负责翻译了第二部分、第三部分的第一章以及第四部分,最后由李慧明负责统稿。

最后,译者特别感谢郇庆治教授的热情帮助和鼓励。他在百忙之中对本书的译稿进行了精心细致地校对和指正,并且亲自翻译了耶内克教授专门为本书所写的中译本序言。当然,由于译者水平所限,加之本书的作者主要都是德语背景,相对而言,其所写的英文论文理解起来就更加有一定难度。译者的翻译或许仍然存在诸多错漏和谬误,这种责任理应由译者承担。

译者

2011年11月分别于济南和柏林

中译本前言

当笔者 1981 年 1 月在柏林市议会提出“四个生态现代化”的建议时,有人提醒我,中国也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今天,中国的现代化思路已清晰地包含了环境向度。因此,我很高兴地看到,由柏林自由大学环境政策研究中心(FFU)研究人员撰写、主要基于同行评审的论文组成的专题文集,即将出版它的中文版。

“生态现代化”是 1998 年进入德国联邦政府的“红绿联盟”的政策指针和主题词。今天,这一术语已经有了许多的同义语,从“工业的‘绿化’”到“生态高效的革新”、“绿色增长”以及“绿色经济”。值得一提的是,在笔者最早的关于“生态现代化”的论述中,这一概念有别于环境政策的其他三个方面——它们并没有相类似的、经济上的优势和多赢收益,即环境破坏的修复、末端治理(end-of-pipe)与结构性改变。当今世界的绿色增长和生态繁荣的成功故事主要是由“生态现代化”写就的。但应该指出的是,环境修复仍然是政府的重要活动内容(比如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而“肮脏”工业与技术仍然需要末端治理(比如过滤设施),这些几乎都会导致附加性成本的增加。“生态现代化”是一种通过转向(更)绿色技术而节约资源和成本的技术性改变。它对革新、生产力和竞争力的贡献,决定了它是一种成功的战略。对笔者来说,这始终是一件“知易行难”的事情。“生态现代化”被广泛接纳很可能要耗费很长时间——直到生态繁荣局面的出现,也许是很长很长的时间。

正在进展中的生态效率革命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但如果没有



这种激进的技术结构改变,其他所有进展都将无从谈起。我们同样需要的是一种更加趋向环境友好社会的结构性变革,这种变革会涉及基础设施、生活风格或(交通密集的)全球劳动分工以及增长取向。至少在西方社会中,增长一直是对失业、贫穷或财政赤字等难题的结构性解决方案的替代。如果我们切实通过找到结构性变革方案来解决这些难题,那么,我们的社会也许会变成不太依赖经济增长的社会。仅就附加值来说,GDP的增长似乎是环境中立的。但危险在于,物质消耗的增加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交织,就肯定会存在一种增长争论,无论就是环境保护还是资源可获得性来说,都是如此。至少在高度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中,“绿色增长”将会是一种温和的增长,速度慢得足以在可持续发展的框架下加以管理。相比之下,笔者更偏爱“绿色经济”这一术语,它将能够“带来人类生活条件的改善和社会平等,同时又能实质性减少环境风险和生态稀缺”(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走向一种绿色经济》,2011)。

马丁·耶内克

2011年10月于柏林

序 言

“生态现代化”——着眼于超越末端治理解决方案的技术革新——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已经成为德国环境政策的一个重要因素。例如,这种政策促进了可再生能源技术出口的迅速增加,并通过现代技术的应用而使排放减少。德国已经展示了革新导向的战略能够诱发环境友好部门的增长。

我们能够鉴别在这种成功政策背后的一些关键驱动力量。环境技术领域的革新需要管治的支持,也需要政治的现代化。多层管治及多部门管治的新模式必须得以发展。诸如为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强制性“电网回购”(obligatory feed-in tariffs)或排放交易之类的新型管理手段已经赢得了重要地位。在这个进程之中,政府和民族国家的作用虽然已经发生了变化,但并未受到严重削弱。我同意本书作者们的观点,政府既是环境政策革新也是环境技术革新的重要驱动者,它们通过提供成功的政策——建立在清洁(更清洁)技术基础上的政策——为其他国家创造了一种示范效应。这种最优实践(best practice)经常导致政策的扩散以及“经验学习”(lesson drawing)。全球环境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国家政策的革新为基础的,而这些革新政策随后被其他国家采纳。例如,德国的“电网回购”政策现在已经被世界上 30 多个国家采用,其中也有一些发展中国家。相似地,荷兰的环境政策规划也已经影响了世界上 100 多个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国家战略的制定。



该书描述了政府在全球环境政策领域的新作用。它突出强调了在环境领域政策革新与技术革新以及它们二者之间相互影响所产生的巨大潜力。它表明,具有较高发达程度的发达国家政府不仅具有为全球环境问题的解决提供先驱性解决方案的潜力,还具有支持为促进更好技术发展的领导型市场(lead markets)服务的责任与义务。因此,该书具有重要的价值,它告知我们什么是可能的,以及从这种可能性出发我们会走向何方。

对于德国联邦政府的环境、自然保护与核安全部而言,柏林自由大学环境政策研究中心(FFU)所提供的生态与政治现代化研究经常被证明是具有重大价值的。确实,它二十年来的研究活动已经为所有政治行为体提供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学习过程。不单单基于上述原因,我希望环境政策研究中心将来继续取得更多的成果。

于尔根·特里廷

目 录

导 言	(1)
-----------	-----

第一部分 生态现代化与先驱国家的作用

第一章 生态现代化:新视点	(9)
第二章 环境革新的领导型市场:民族国家的新作用	(29)
第三章 环境政策的领潮者:先驱国家的特征和作用	(45)
第四章 全球环境政治中环境决策的能力建构	(58)

第二部分 环境政策革新的扩散

第五章 环境政策革新的扩散:一个新分析框架的基础	(83)
第六章 规制工具的全球扩散: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环境体制	(108)
第七章 可持续发展管治的跨大西洋次国家层面经验学习	(130)

第三部分 环境管治的里约模式

第八章 环境管治的新路径	(151)
第九章 协调可持续发展:对现状的评估	(190)
第十章 政府自我规制的制度与措施:跨国视角下的环境政策 一体化	(211)



第四部分 能源政策的绿色整合

第十一章 目标趋同结果相异 (233)

第十二章 生态税改革：国际比较视角下的环境政策革新 ... (273)

第十三章 德国核电的逐步退出：政策、行为体与议题 (291)

第五部分 国际环境管治

第十四章 管理机构真的重要吗 (323)

第十五章 私人管治的制度化：营利性和非营利性组织如何达成
跨国性规则 (351)

第十六章 国际河流流域管理的成败：南部非洲的案例 (374)

导 言

环境政策制定尽管是国家活动中一个相当年轻的分支,但它已经在所有发达国家演化成了一个非常特别的政策领域,涉及各政策层面中关系政策制定的复合性系列行为体与制度。在政府体系内部,它已经赢得了重要地位,尽管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其在一些主要议题领域也存在着倒退和失败。

环境政策起源于丰富多彩的政治学研究的相关主题。这个领域的几个标志性特征已经吸引了学术界的特别注意。例如,拥有几百个国际协议的综合性国际框架,应对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需求,对于相应决策而言具有重大意义的知识的重要性,非政府行为体的兴起及其越来越大的重要性,等等。许多政治学者正在研究这些及其他一些相关现象。为了分析环境政策,新的概念、理论以及研究方法已经得以发展。

此类研究已经涉及的问题有:政府怎样解决来自环境退化的挑战?涉及哪些行为体,它们分别追求什么样的战略?哪一种制度得以发展以及应用什么样的手段?环境管治的模式随着时间的推移怎样以及为什么发生变化?哪一种模式是成功的?环境政策在不同的社会经济领域,如在经济与市民社会以及政府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哪一种方法已被证明是最为成功的?

在这个领域,柏林自由大学环境政策研究中心(FFU)是一个积极的行动者。作为一个主要建立在第三方资助基础上的研究机构,它覆盖了广泛的研究方法和议题领域。然而,它在发展演变的过程中主要涉及以下几个关键的研究领域: